

基于民间文学文本的俄汉社会图景对比研究

徐 佩 冯小庆

(哈尔滨理工大学, 哈尔滨 150040)

提 要：民间文学是一个民族宝贵记忆的语言载体，记录着该民族的价值观念与行为准则，在代代相传的过程中将其中描绘的生活画卷与情感评价延续至今。作为广大民众创作的口头叙事文学，民间文学的主题离不开人民日常生存的社会环境，反映民间对社会制度和社会各阶层的真实认识与态度。俄汉两个民族拥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留下大量耳熟能详的民间文学文本，为了解本民族的传统世界图景，知悉彼此认识世界的特点提供了重要的媒介。以民间文学为文本，不仅可以勾勒和呈现其中俄汉两个民族的社会图景和社会理想，而且可以依此进行对比，而从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宗教信仰三方面探析彼此异同的根源，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两个民族的文化特点与思维方式。

关键词：民间文学；社会图景；俄汉对比

中图分类号：I27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世界图景这一术语是由德国物理学家赫兹(H. Hertz)首次提出，用来表示外部事物的内部形象的总和，后逐渐成为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被定义为“世界的总体形象，是人所有精神能动性的结果”(Серебрянников 1998: 19)，是对自身及周围世界的认识。世界图景形成于对世界的认知过程，但物化于人的行为和文化产物中，其中能够反映民族集体认知的民间文学即是世界图景的物化文本之一。民间文学是人民群众集体创作的口头叙事作品，记录传承着民族的知识经验与传统伦理，形成反映集体意识的世界图景的重要载体。“民间文学的世界是规范的世界”(Никитина 1993: 90)，带有鲜明的评价与情感取向。同时根植于民间文学产生的经济、社会和宗教土壤，带有本民族生活与认知的烙印，因此民间文学图景既能反映出不同民族所处封建社会共同的价值判断，也具有民族差异性。

社会图景是民族文学图景重要的组成部分。社会是指生活在特定边界内，分享共同文化特征及基本行为规范的一群人，也包括制度与制度间相对稳定的关系。社会分层是社会的基本构成之一。在俄汉民间文学图景中，社会分层主要表现为阶层间存在权利与义务差别的封建等级制，社会图景呈现出君主专制、阶层间矛盾尖锐与阶层转换的特征。由于民族制度与文化的差异，在封建等级共性之外，俄汉社会图景也存在着差异。

2 社会图景中的君主专制

俄汉民间文学多创作于封建专制时期，因此以相同统治制度为创作背景的两族民间文学描绘的都是以君主为最高统治者的阶级社会。但受宗教思想与治国理念的影响，俄汉民间文学中的君主专制又呈现出各自的特点。

2.1 君主专制

君主是封建集权社会最高的统治者，拥有至高的权力。俄罗斯民间文学的君主被称为沙皇。沙皇是 16 世纪从拜占庭传入莫斯科公国的君主尊号。古罗斯时期，是通过全体成员出席的“谓彻”会议决定氏族内的重大事务。统一的基辅罗斯时期基辅大公开开始加强中央政权，但随后公国间的内讧让罗斯遭受多年的外族统治。随着经济实力、军事力量和取胜鞑靼人威望的增强，1157 年莫斯科王公伊凡四世加冕为沙皇，从此沙皇成为中央集权制度的最高统治者。沙皇的无上权力在民间文学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如沙皇拥有独立的决断权，在《野兽的奶》（Звериное молоко）中，沙皇即使会向杜马和大贵族征询处置妻子的意见，但仍会按照自己的意志执行；沙皇可以任命和撤销官职，在《牛角》（Рог）中，沙皇非常喜欢主人公，就让他做部长，沙皇出国三年期间还让新部长帮助管理国家，而在《森林里的士兵和国王》（Солдат и царь в лесу）里沙皇将勇敢的士兵封为将军，把士兵胆小的哥哥降级了；沙皇有权处置他人生命，“既然你已经在我这夸下海口，那么你必须做到；否则我就会用我的剑，砍下你的头”。（Афанасьев 1984c: 27）沙皇的权力印证了俄罗斯的谚语，“沙皇的话一就是法律”。

中国由于悠久的历史，在民间文学中出现的君主既有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国君，也有秦始皇一统天下后的皇帝天子。但不论哪个时期的君王，都实行的是集权制，而且中央集权的程度日趋加重，“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中国的民间文学中也记录了君王的专权。皇帝有任命和罢免官员的权力，《天理和良心》中，皇帝要赐官给治愈母亲疾痛的天理，而《萧郎与凤凰仙子》中不仅罢免了欺君的知府官职还处斩了他；君王握有他人的生杀大全，如《莫干剑》、《雌雄剑》中为获得宝剑的唯一所有权，吴王与越王下令处死铸剑师；《乾隆的理发师》、《余裁缝巧制慈禧衣》中多位理发师和裁缝由于不能令皇帝和太后满意而惨遭杀害；为了保住专权，不惜杀害开国功臣，《火烧庆功楼》的朱元璋就萌生此意。

民间文学虽为人民想象的产物，但并没有完全脱离所处社会环境，在抒发美好愿望的作品中，两国人民还是保留了对等级社会中最高统治者权力的描述与畏惧。

2.2 君主专制的民族特点

2.2.1. 俄罗斯的君权神授与君主威严

君主专制制度能在中国两国历史上长期生存，除了经济和制度的原因，深入民心的强调君权神圣性的宗教学说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但两国封建君主依托的思想并不相同：俄罗斯沙皇的“君权神授”来自于东正教，中国的皇帝则依靠“天命”为皇位寻找合理性与不可侵犯性。

公元 988 年，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为统一古罗斯各部落，接受东正教为国教，从此东正教成为俄国封建专制统治的基石。东正教强调，沙皇是真理的代表，是基督在人间的代表，是人民的救世主。权力源于上帝，属于沙皇，沙皇就是人间的上帝，因此君主的意识便是上帝的意志。在信奉上帝的俄罗斯人民心中，皇权即神权，效忠沙皇即是为上帝效力。随着东正教在俄罗斯的传播，“君权神授”思想深入人心，使被神化的专制君主获得了广大民众的尊重与认可，也使觊觎政权的谋朝篡位者遭到唾弃。对沙皇的神圣认识在下层人民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即使到了 20 世纪初，人民仍然坚信沙皇是上帝意志的执行人，沙皇权威不可侵犯，以致于到农村宣传用革命来推翻沙皇专制的民粹派却受到了来自人民自身的反对。正是基于此现实状况，俄罗斯民间文学中的沙皇得以正面形象出现在民间文学中。

沙皇能够做到公平公正，赏罚分明，犯错的人，即使是王子，同样会受到沙皇的惩罚。在《王子和他的看护人》（Королевич и его дядька）中，沙皇发现王子放走了被囚禁的壮士，作为惩罚“给了他（王子）一个侍从，让他离开国家去远方”（Афанасьев 1984a: 128）；沙皇能够以才干和品行作为分配官职的标准。在沙皇眼中，领主有可能是“蠢鹅”，大贵族和将

军也不配自己的地位。因此，沙皇会让聪明的农夫将沙皇给出谜题的谜底卖给愚蠢的贵族，还会命令“大贵族脱下自己的贵族衣服给农民穿上”（Афанасьев 1984c: 54）；沙皇也会为人民解决实际困难，在《神奇的马》（Волшебный конь）故事中，农夫爷爷请求路过村庄，被误认为是领主的沙皇作他孩子的教父，沙皇不仅没有拒绝农夫的要求，还给贫穷的农民洗礼用的钱，“好的，给你一百卢布用作洗礼；明天我亲自到”。

作为一国之君，俄罗斯的沙皇与中国的皇帝都十分看中自己的权威，任何质疑有辱君王威信的言行都会受到严惩，欺君必会招致杀身之祸。这与君权带有的神性密切相关，也受到宗法制度的深刻影响。两国的君主为维护专制，在日常生活中推崇父权为主的宗法家庭关系，以期借助社会的约束维护政权的稳定。

但俄罗斯民间文学中的沙皇与中国民间文学中的皇帝相比更加严厉，多以威胁和惩戒他人的形象出现，常说的话就是“如果这次你能够完成命令，那么我就会奖励你，而如果完不成，我就会惩罚你”。这是因为，作为封建俄罗斯家庭手册的《治家格言》中主张一家之长必须是严厉的，唯有此才能得到其他家庭成员的尊重。因此，作为俄国这个大家庭的家长，沙皇更应当是严厉的，才会获得作为其子女的人民的尊重。严厉的君主具有令人生畏的气质，可以震慑外敌，保护国家和人民。而且严厉的沙皇可以保障正义得以实现，外敌和犯错的人会得到真正的惩罚，给人民以公正的对待。这也是俄国传统社会各阶层对沙皇形象的共同认识。

2.2.2 中国的君王天命与尊君重民

中国封建专制政权的思想支撑是“天命”观。《尚书·召诰》里记载，有夏服周王朝时，就称武王是受天命，自称周天子。《论语·季氏篇》也提到，“天下有道，礼乐征伐军令自天子出”。当时的君主要代人民向天进行祭祀，以示自己是天神派来统治大地的，而当时的统治者称天子亦是这个原因。秦始皇的玉玺上刻着“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可见中国帝制专制君主视自己的权力由上天所赐。儒教董仲舒提出了“天人合一”的理论，认为天和人间是相通的，人应按天的意志来行动。在《春秋繁露·三代改制制文》中，董仲舒提出“古之王者受命而王。……故天将授舜……天将授禹”。“天人合一”是中国政治社会定于“一”的理论基础，中国的皇帝专制和中央集权、意识形态的一元论由此得以巩固。（包万超 2013: 33）民间对天命的敬畏反映在民间文学中，表现为较少百姓与皇帝直接产生冲突的情节，即使遇到昏君，也多以争取公平为目的，有能力但来自下层的主人公并未取代昏君成为新皇帝，如《十兄弟》惩治完昏君后就离开皇宫回到家乡。

此外，与俄罗斯沙皇相比，中国民间文学中的皇帝更注重民心。《李良审鹅》中，汉高祖刘邦称帝后路过家乡沛县，遇糊涂县官断一个糊涂案，当即为民做主，还民以公道。《李世民三请张古老》中，率兵亲征的李世民遇到粮草危机，但不允许强征军粮，还为感谢百姓出力，命将士一起动手耕种，粮草问题解除后也对父老乡亲之情念念不忘。这是由于中国传统的尚农社会只有在人民安居乐业的前提下，君主的权力才能得以实现。此外，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君主治国的思想依托。儒教主张立君为民，认为有德是君主合法性的来源，强调君主对臣民应施行德治及仁政，从而建立一个“天下为公”、“天下为民”的理想社会。儒教积极关注民生，提倡“民贵君轻”，强调人心相背对于统治的关键作用，努力解决民众的生存发展问题。（陈立祥 2009: 20—24）自先秦以来，得益于儒家的影响力，“仁治”的君主被认为是理想的明君，人民的希望也寄托在“重民”的明君身上。

3 社会图景中阶层矛盾尖锐

阶层间的矛盾冲突是俄汉民间文学讲述的主题之一。对立的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由于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一矛盾在民间文学中得以真实的再现。而不同的生存土壤，又让同样的矛盾有不同的表现。

3.1 土地所有权导致的阶层矛盾

经济制度是社会运行的基础和保障,经济关系决定着社会图景的特点。封建时期的中俄社会都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农业是当时社会主要的经济来源,土地是社会财富的供养者。在古代中国,随着土地私有制的出现,土地成为各阶层角逐的目标,越来越多的土地转移到富有的少数人手中,导致“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而16世纪俄罗斯全面实行的农奴制与古代中国地主利用政府减轻田租的政策大量兼并土地一样,致使失去土地所有权的农民只能在私有土地上劳作以换取基本的生活资料。因此,不仅要辛苦劳作,还有上缴贡赋、服服役的农民与握有大量土地和生产资料的土地所有者之间形成了不可调和的阶层矛盾。

在俄汉民间文学中,借助对土地所有者无情的嘲弄与对农民优秀品质的颂扬,充分反映了尖锐的阶层矛盾,抒发了人民追求社会公平的心声。下层人民抨击最多的是与其有日常经济往来的地主,人民对其充满怨恨与憎恶。地主为了攫取最大利益而具有的贪婪和剥削的阶级属性在两国故事中得以如实的展现。在俄罗斯民间文学中,农民的儿子得到宝物后宴请村中富有的地主,但是客人们看到满桌的银子很吃惊,立刻开始抢夺起银子并藏了起来。为了能让他的雇工尽可能地多干活,“一分钟都不让他休息,简直就是用各种工作将他们折磨到极点”。中国故事《六尺布》里的地主“收租要课,敲诈民财,就像一个填不满的天坑,百姓被害苦了,给他送了个外号叫“填不满”。《聪明的画师》里的地主“兄弟三人,尽都为富不仁,平日横行乡里,鱼肉百姓。他们家每请帮工,开头便要出些难题,有意找岔子,最后借故赖掉工钱,百姓对他们恨之入骨。”有的地主苛刻的方圆百十里没人愿意给他揽工,连菜叶子都不愿意给长工吃,“拿上个窝窝头走着吃,免得误工夫”。(中国民间文学集成陕西卷编辑委员会 1996: 572)

而下层人民则会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勇于对抗地主压迫,用机智严惩作恶的地主。俄罗斯民间文学和中国民间文学都有地主要求长工公鸡打鸣就起来干活的情节。面对苛刻的要求,俄罗斯的长工会事先把“公鸡的头绑到翅膀下”,这样公鸡就不会叫早,长工就会睡到自然醒。中国的长工则借捉偷鸡贼的机会,把半夜学鸡叫的地主一顿痛打。为了惩戒吝啬的地主,《帽子下的鹰》(Сокол под шляпой)中的农夫不仅从地主婆手中骗来穿着裘皮的猪,而且又假扮路人,从追赶他的地主那里骗得三百卢布。《赌吃鸭》里地主本想占长工便宜,要求长工十天内吃不光一百只鸭子就给他白干一年工,结果机灵的长工不仅用计完成任务,还赚了地主一百只鸭子。

3.2 阶层矛盾产生的民族差异

土地所有权是阶层间对立冲突的根本原因。但俄罗斯的宗教与中国的地方权力也加剧了阶层间的对抗。

3.2.1 俄罗斯东正教因素

在沙俄时期,僧侣阶层与贵族阶层一样,拥有自己的土地。在伊万四世时期,牧首就为僧侣争取到土地的所有权。在16—17世纪,僧侣为了能够定居在一个地方,采取了所能想到的所有方法,其中就包括“与教区公社签订合同,规定他们世袭掌握房屋、教堂土地和收入的权利”。(米罗诺夫 2006: 88)因此,教堂用地成为神父等神职人员的私有财产。列宁在《关于农村的贫困》(К деревенской бедности)文章中也写到,“我们的神甫向农民布道禁欲与节制,而自己却以正当和不正当的手段积累了大量的土地”。(Ленин 1934: 146)僧侣与东正教教义不符的言行使得人民对僧侣的不满就如同对地主的厌恶一样,被人民反映在民间文学中。如《宝藏》(Клад)中,不肯为贫穷的农民安葬妻子的神父;《神父和雇农》(Попов работник)中,刻薄雇农的神父;《强盗》(Разбойники)里,为钱把女儿嫁给强盗的神父。

此外,直到19世纪初在农村仍然占有重要地位的多神教也是造成东正教的僧侣阶层在民间文学中只有负面形象的主要原因。东正教受洗前罗斯信仰的是多神教。为了尽快在罗斯

推行东正教，在民间保留了多神教的部分信仰，在东正教的节日中仍可见多神教的元素，形成了俄罗斯特有的“双重信仰”。东正教与多神教持续的斗争使得农民无法信任僧侣，僧侣自身的不自律也加深了其在现实社会也既受到贵族的轻视，也得不到下层阶层的尊重。

别林斯基在给高尔基的信中写道，“难道您不知道，我们的僧侣处在俄罗斯社会和所有人民的普遍轻视中么？俄罗斯人民的下流故事讲的是谁？就是神甫、神甫的妻子、女儿和神甫的长工……对于所有俄罗斯人来说俄罗斯的神甫不正是贪吃，吝啬，卑躬屈膝，无耻的代表么”。（Белинский 1954：215）

古代中国佛教和道教的僧侣并不拥有土地，与下层人民不构成经济对立关系。而且佛教主张向善，道教主张众生平等，反对为富不仁，因此在中国民间文学中，佛教的僧侣和道教的道士总是向贫苦的人民伸出援手，救人民于疾苦，如《棒槌沟的传说》收养弃婴的小道士；《济公与飞来峰》里挡掉飞来的巨石，拯救了灵隐寺前整个村落的百姓的济公等。

3.2.2 中国封建社会地方权力

相比宗教，封建中国的地方机构是影响阶层矛盾的重要因素之一。与俄罗斯民间文学相比，中国民间文学中有相当数量的关于百姓智斗地方官员的故事。县令是中国民间文学中最常出现的地方官员。本应为民做主的父母官，但“有一个怪脾气，一看到穿粗布衣服的农民，就不舒服，根本不理公务”（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江苏卷编辑委员会 1998：555）；十分贪财，总是觊觎百姓的财产，如《神葫芦》中县令带领三班衙役到贫穷的老夫妻家里，抢夺和尚送给他们的神葫芦；公然收取贿赂，胡乱断案，《理是官老爷》就说“那时节打官司，有钱能使鬼推磨”（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江苏卷编辑委员会 1996：615）；《蚌壳精》也说，“衙门都为有钱有势的人开的，我们没有办法。”审案过程也随心所欲，“自古福人不记时；他舒服了，被审的人可受罪了。那时候没有钟表，他要审问多少时间，决定他是否困倦，往往被审问的人跑得膝盖酸痛，头昏眼花。”

这一负面形象的产生与由我国古代的行政制度密切相关。自秦以来古代中国成为中央集权国家，但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一直处于博弈制衡之中。中国历史上的地方政府以“县”为单位，县以下不再设置行政机关。（钱穆 2016：15）作为地方政权的行政机构，县负责管理基层乡村社会秩序。《后汉书·百官志》中规定了县所应承担的职能，“（令长）皆掌治民，禁奸发恶，理讼平贼，恤民时务，秋冬集课，上计于所属郡国”。但县令实际权限更大，从登记人口，收缴赋税，力役安排到维护治安，司法量刑皆由县令负责。古代社会由于交通、通讯的不便，造成“天高皇帝远”，中央政府无法对其行使有效的监督管理，地方政府经常只手遮天、做起“土皇帝”，欺上瞒下、鱼肉人民。百姓饱受其害，但苦于申诉无门，只能在《虎头鞋》、《不得了》等故事中痛斥草菅人命，搜刮民脂民膏的县太爷，为自己伸张正义。

4 社会图景中可转换阶层地位

民间文学是人民集体创作的，反映人民心声的口头叙事作品，因此从人民的角度，维护公义、实现社会公平是民间文学追求的结局。在现实社会无法实现的任人唯贤，为下层人民提供改变阶层地位可能性的诉求在民间文学中都得到了满足。但在阶层转换的方式上，俄汉民间文学描述的途径有所不同。

4.1 阶层划分不公

在封建时期，人的阶层属性取决于出生家庭。以出身而非能力将人归为固定的社会群体，分为等级差异的各个阶层，引发下层人民的不满。经济和政治上处于绝对优势地位的上层阶层对下层人民的剥削与压迫，使得在表达人民真实心声的民间文学中大胆讽刺抨击君主及其近臣。例如在俄罗斯民间文学中沙皇独断专行，在事实不明的情况下将皇后封入大酒桶，扔到海中；残忍无情，为得到缝制精美的王冠，命令宪兵剜除被俘士兵的一只眼睛；愚蠢无

能，轻易就被狐狸所言所骗，将公主嫁给一无所有的农夫。在中国的民间文学中，同样有轻信谗言，没有经过核实就处死驸马的皇帝，如《龙台驸马千古恨》；也有为保住宫殿秘密，杀害全体工匠的残忍皇帝，如《伍子胥复仇》；还有由于不会用火，在柴和米充足的情况下竟然《饿死的皇帝》。

至于君主之下的官员，也多以负面形象登场。在俄罗斯民间文学中大贵族都是贪婪自私因为“普通百姓非常痛恨贵族”。（Модзалевский 1925: 40）有以权谋私的贪官小人，如《包公斩国舅》中庞国舅以为皇上采办银鱼的旗号，巧取豪夺，欺男霸女、杀人灭口；《眼中钉》中，后唐大臣赵在礼十分贪婪，他一生历仕三朝十余镇，每到一地则横征暴敛、强行搜刮、民不堪命；《刘罗锅智告贪官》中，和糶借修理正阳门御道之机，将建筑材料偷梁换柱，谋取不义之财。

4.2 阶层流动途径的民族差异

4.2.1. 俄罗斯下层人民借助神奇助手实现阶层流动

沙皇俄国是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社会内部等级森严。出身、财富、职业、教育对个人在社会中的发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各阶层权利、居住地和社会地位无条件世袭。贵族是特权阶层，参与国家政事管理。而农民没有任何特权，权利也极少。俄国社会结构稳定，各阶层之间虽然可以流动，但变化缓慢，转化也多发生在僧侣和城市阶层之间。贵族向其他阶层流动的现象极少。而农民想要成为贵族，则只有通过参军、上大学或任文职来实现，因为根据《官阶表》的规定，所有军官都可以自动成为世袭贵族，所有文官自动成为终身贵族。其中进入军队对农民阶层而言是更有希望的选择。但作为农民出身的士兵，只有在战场立有战功才有机会成为军官，而且国家不断提高对军衔的要求，因此只有极少数农民能够成为贵族。

同时对于信仰东正教的俄罗斯人民来说，虽然认可君权是神圣的，但也承认“坏沙皇”的存在。在传统的俄罗斯社会，“坏沙皇”被民众看做是违背真理和基督的“敌基督”，不是真正的沙皇。真正能拯救人民，所作的一切都是有利于人民的沙皇存在于民间。（Тихомиров 1992: 247—254）俄罗斯历史中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普加乔夫就是利用“真正沙皇”的名号得到人民支持的。因此阶层转换的现实难度与对“真正沙皇”的诉求，让俄罗斯民间文学的主人公只有神奇助手的帮助才能进入特权阶层，甚至成为沙皇，例如《在去不知道是哪里的地方》中射击兵借助宝马的帮助，杀死了残忍的沙皇，自己则被选为新沙皇；《宝马》（Конёк-Горбунук）中农民的儿子傻瓜伊万在父亲赠予的宝马助力下完成重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终于娶到公主，获得半个王国。

在《两种命运》（Две доли）的故事类型中善良勤劳的穷弟弟能够积极地唤醒自己的“命运（Доля）”，让其指出致富之路。命运是古罗斯多神教中的神灵，被认为是人幸福的掌管者，负责给人带来运气和成功。根据民间传统认知，人的命运是从人到这个世界开始就先天注定的。但同时，民间又认为命运是可以被收买或唤醒的，因此阶层的转变可以向命运求助。

从下层阶层直接成为沙皇是人民的美好幻想，也是对在现实中受压迫的优秀人们的精神补偿。但东正教的君权思想和人民对真正沙皇的期盼，使得俄罗斯人民并不想推翻封建专制。别尔嘉耶夫（Н.Бердяев）认为，“俄罗斯人民似乎想要的不是自由的国家，而是不去管理国家，不用操心人间制度的自由”，俄罗斯人民对待国家政权的消极特征是“俄罗斯民族和俄罗斯历史的典型特征”。（Бердяев 2000: 275）

4.2.2 中国下层人民通过科举与武装起义完成阶层转换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下层阶层转换身份的主要途径是科举考试。科举考试制度始于唐代。“考”是指成绩，“试”是指试用。科举制度较之前朝的选举制，更为开放，只要不为工、商阶层皆可报名。也无需经地方官察举，直接参加礼部尚书组织的考试。考试及格即为进士

及第，获得做官资格。（钱穆 2016:53）初期应试的考试多出于门第之家，后苦读的贫困书生增多。科举制度不问出身，唯才是举，扩大了选拔政府官员的社会阶层。《人行好事，莫问前程》、《剃头状元》和《穷秀才中举》等主人公都是出身穷苦，经过多年寒窗苦读，以自身学识通过科举考试的书生。他们获得官职后，不忘出身阶层疾苦，多体恤百姓。但由于获得考试所需知识要聘请老师，还要花费大量的读书时间，因此生员多出自富裕家庭，贫寒子弟仍是少数，科举制度还是受到文化级差，社会级差的制约。（冯天瑜 2014: 47）

武装起义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改变阶层属性的另一种途径。在民间文学中记录了许多武装推翻在任君主的事例，如《朱元璋寻访常遇春》、《一文钱难倒英雄汉》中的主人公朱元璋传说其起兵之前当过乞丐和尚，后来推翻元朝统治，做了皇帝；《池中物》中刘备、关羽、张飞从卖鞋、卖肉、卖枣的小贩到后来建立蜀国，三分天下，成就了一番伟业；《饿死的皇帝里》梁武帝被叛军追杀，最后饿死。

宗教在武装起义中也起到一定的作用。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带有浓郁的中华民族古代宗教意识的色彩，在其漫长的历史中其神权思想是封建君主维护专制的思想手段。同时由于封建压迫，生活苦难，无法改变物质生活的下层人民转而寻求精神安慰。道教的太平道和五斗米道以及后来的符篆派呼应人民建立生存乐土的愿望，在民间得以广泛传播，因此常为农民起义利用，使道教成为联络和组织群众的工具（李养正 2001: 3），黄巾起义即是信奉《太平经》的张角利用宣传道教思想组织的反抗专制的农民起义。虽然起义多以被镇压告终，但人民对抗现实的斗争情绪没有停止。利用道家法术意图射死皇帝的《茅庵洞》故事就是“透过幻想的外衣，看出当时人们反封建斗争与心理的一个侧面”。（刘守华 1983: 41）

5 结束语

作为对世界认识的载体，民间文学记录着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承载着一个民族带价值判断的精神活动。民间文学以或魔幻，或讽刺的叙述形式描绘着所处的社会图景，但在对人物行为的评判中，在对故事结局的设定中可以勾勒出故事讲述时期的社会特点。

俄汉民间文学由于经历相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因此在对社会的呈现，社会理想的表达中具有共同性。但受两国历史上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与宗教思想的制约，社会图景又具有差异性。在共性中发现不同并探寻构成不同的原因，有助于了解俄汉传统的社会价值取向和民族心态，为进一步深入探索两个民族完整的世界图景，加深彼此间的认识有一定的助益。

参考文献

- [1]Афанасьев А.Н. Народные русские сказки(Т.1)[М].Москва:Наука,1984a.
- [2]Афанасьев А.Н. Народные русские сказки(Т.3)[М].Москва:Наука,1984c.
- [3]Белинский В. Г.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5).Статьи и рецензии, 1841-1844[М].Москва:АН СССР, 1954.
- [4]Бердяев Н. Судьба России:Сочинения[М]. Москва:Эксмо-Пресс, 2000.
- [5]Ленин В.И. К деревенской бедности//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Т.7)[М].Москва: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1934.
- [6]Модзалевский Б.Л., Оксман Ю.Г. Декабристы:Неиздан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и статьи[М].Москва:Изд-во Всесоюзн. об-ва полит.каторжан и ссыльно-поселенцев, 1925.
- [7]Никитина С.Е. Устная народная культура и языковое сознание[М]. Москва:Наука,1993.
- [8]Серебрянников Б.А. Роль человеческого фактора в языке:Язык и мышление[М].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8.
- [9]Тихомиров Л.А. Монархическа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М]. СПб.: Комплект, 1992.
- [10]包万超.天人合一与儒教宪政的哲学基础[J]. 学术研究, 2013(3).

- [11][俄]鲍·尼·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M]. 张广翔等译. 山东：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
- [12]陈立祥. 儒家核心价值观对封建社会思潮的有效引领之策略探析[J]. 天府新论，2009(4).
- [13]冯天瑜. 科举制度—中国第五大发明[J].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2014(1).
- [14]李养正. 道教概说[M]. 北京：中华书局，2001.
- [15]刘守华. 道教与中国民间文学传说[J]. 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83(5).
- [16]钱穆.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M].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
- [17]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湖北卷编辑委员会.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 湖北卷[M]. 北京：中国 ISBN 中心，1999.
- [18]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江苏卷编辑委员会.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 江苏卷[M]. 北京：中国 ISBN 中心，1998.
- [19]中国民间文学集成陕西卷编辑委员会.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 陕西卷[M]. 北京：中国 ISBN 中心，1996.

A Comparative Study of Russian and Chinese Social Scenes Based on Folk Tales

Xu Pei, Feng Xiao-q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arb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rbin 150060, China)

Abstract: Folk tales are language carriers of valuable national memory, recording values and behavior standards of the nation, in which picture of life and emotional evaluations could be handed dow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As an oral narrative literature created by the general public, the theme of folk tales can 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social environment of people's daily life. Both Russian and Chinese people have a long history and rich culture. Their folk tales provide important means to understand their traditional picture of the world and features of understanding the world respectively. Using folk tales as text can not only outline and present Russian and Chinese social profiles and social ideals, and based on the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from the aspects of economic system, political system and religious belief, further understandings of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way of thinking of two nationalities can be achieved.

Key words: Folk tales; social picture; Russian Chinese comparison

基金项目：本文系黑龙江省哲学社科基金项目“俄汉民间文学中的民族认同比较研究”(19WWB059)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徐佩（1979—），女，山东武城人，教授，博士，从事俄罗斯社会与文化研究；冯小庆（1980—），女，内蒙古呼和浩特人，讲师，博士，从事俄罗斯社会与文化研究。

收稿日期：2021-03-07

[责任编辑：刘 锐]